

权力表征、符号策略与传统公共空间存续

靳永广,项继权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农村公共空间不仅是农民公共活动的空间,也是村庄社区和国家权力互动和展演的场所。以浙西北 S 村朱氏祠堂为观察对象,探讨作为农村传统公共空间的祠堂的现代转型及其存续发展逻辑。研究发现,生活主体并非传统公共空间遭遇现代中国革命和政治冲击场景中的消极受动者,而是善于因时采纳并巧妙借用政治话语策略性装饰传统公共空间,从而在意义编织中持续重构空间的存续正当性。经由政治符号填充的公共空间,成为表意政治和聚合认同的统合性承载场,强化了空间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再生产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个案经验表明,传统社会符号与现代政治符号能够相安共生且良性互动,应赋予传统事物以现代意义而非全然抛弃。空间生产的三维构件并非完全割裂而是有机嵌合。空间的物理形态和价值意义都被改造着但后者远远超过前者。

关键词 政治符号; 公共空间; 空间政治; 符号权力; 祠堂

中图分类号:C 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0)03-0119-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0.03.014

人是具有空间性的动物,因为“每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1]。人的社会性和生活的空间性,使得我们所处的空间既非纯粹物理形态的绝对空间,也非单一社会容器性质的功能空间,而是更多地表现出结构化的社会空间面向。这样的结构化面向,有机嵌合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重要素,决定并反映着特定空间中施动者和受动者及其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存在于特定空间中的人们并非是完全的消极受体,而是积极地从事着诸如交换和分配等活动,并能动地对空间进行着物理改造或意义填充等具体实践。简言之,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

生活世界中存在着大量公共空间。按照是否可见,可将公共空间简单划分为实体公共空间和抽象公共空间。本文关注的,是村庄公共生活中形成的、有着固定边界和特定方位的实体空间,即农村公共空间。这样的实体空间,既是村庄文艺表演和村民交谈等公共活动开展的主要场地,也是仪式庆典和信仰寄托等延续集体记忆的承载平台,更是国家及其代理人行使公共权力的展示场所。可以说,农村公共空间是一个集社会性、文化性和政治性等多重属性于一体的重要场所。这样的空间的维系,离不开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以及公共资源四大要件^[3]。如果仅考虑公共空间承载村庄集体活动的功能,其实则是社会学意义上所讲的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4],是一个被附加了许多外在属性的文化范畴^[5]。如若从政治或权力的维度思考,这样的公共空间便成了国家控制和治理乡村的社会基础^[6],亦即公共权力嵌入、行使和展示的重要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公共空间的盛衰存亡,深深地烙上了公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印记。本文探讨的,正是农村公共空间的政治或权力属性之维。

作为农村公共空间的典型类型,祠堂不仅是家族先祖公祭的场所,也是宗族团聚、公议与“族权”

收稿日期:2019-12-23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研究”(2020MYB05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创新资助项目)“生活形塑制度——以农村宅基地改革为观察样本”(2019CXZZ136)。

作者简介:靳永广(199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基层治理。

行使的场所。也正因如此,祠堂被现代中国革命视为传统封建宗法组织与思想的物化载体和“族权”象征,进而成为必须摧毁的对象。笔者在湖南和浙江等地的田野调研发现,一些村庄的祠堂确实遭到现代中国革命和政治的冲击,不过它们并未被完全毁灭,有的甚至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在当下地方文化建设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带给笔者的问题是,在漫长的政治革命、运动以及暴力打击下,宗祠这一传统公共空间为何能够幸存下来?进一步地,现代社会中宗祠的生存逻辑及其价值何在?这一传统公共空间在适应现代社会和政治需求时,已经或仍在发生怎样的调适、改造和流变?对于当地宗祠为何能够在非常时期保存下来,湖南桥镇金村受访者表示,“我们前辈用泥土将那些当时被认为是封建糟粕的浮雕遮盖起来,避免了祠堂遭受破坏性损害”(YAQ, 20170517)^①。应当说,这样的回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类似于泥土遮盖等即时性乡土策略行动,只是宗祠短期内得以幸存的动因之一。问题是,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1],因此空间构成任何公共形式和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那么,在同样的政治话语下,为什么有些宗祠能够继续保留且发挥重要作用,而有一些则完全被摧毁荡然无存?究竟是在经历了何种“身份”的现代化转型^[8]后,继续保留的祠堂才被现代国家接纳并持续发挥作用?

对于农村祠堂已有诸多的讨论和研究,主要以空间的结构形变、功能意义和行动图景为基本论域,考察祠堂的物理变化、功能继替和主体实践。其中,结构形变集中于建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这些研究或将某一(地区)祠堂置于纵向历时性视野中进行考察^[9-10],或对不同地区(姓氏)的祠堂横向共时性比较^[11],以此呈现祠堂的物理形态演变与地方特色。民俗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承袭“文化-功能”的分析理路,探讨祠堂在宗亲信仰、家族祭祀、乡村秩序以及文化服务等方面的价值作用,强调祠堂是村落中最具整合意义的象征符号^[12],认为传统社会中祠堂承担着个体启蒙、道德教化、失范惩罚和文化遗产等社会教化功能^[13]。而在现代社会中,其依旧发挥着积极的社会建构功能^[14],尤其是祠堂、宗族以及主体的行动理念构成特定地域精神的社会基础^[15]。同时,有学者还将目光聚焦于特定地域,如以浙江省农村祠堂到文化礼堂的转型重构为考察对象,发现传统祠堂文化和现代公共文化相互嵌合且互为补充^[16]。而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则沿着“空间-行动”的解释路径,分析主体的行为逻辑,如以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为研究样本,探讨中国乡村神圣空间的政治建构^[17]。

既有研究成果为后续有关农村祠堂的实证分析拓展了研究视野,为理论延展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理路。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从宏观层面切入探讨祠堂的前世今生和传统价值,很少从微观层面探讨祠堂功能的现代转型和变迁及其嬗变的方式与逻辑;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较少从政治尤其是空间政治的视角切入探究。尽管社会生活空间性的讨论已成为当今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但对于空间过程、变动的动力机制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18]。本文尝试从空间政治学的视角对浙江省安吉县东南端的S村朱氏祠堂进行深度观察和分析,探讨祠堂作为农村传统公共空间的现代转型及其存续发展逻辑。2018—2019年,笔者先后三次到访S村,比较详细地了解了该传统公共空间近70年的功能变迁。18世纪70年代,从安徽歙县(徽州)篁墩迁徙至S村的朱熹后代,在S村自然村——戴村中心地段建造起宗族标志性建筑物,即本文关注的朱氏祠堂。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朱氏祠堂不同程度地遭受破坏,但经过多次功能改造后,其先后成为教育、办公和文化以及宣传等公共空间,且在村庄的社会治理和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空间生产、空间政治性与存续价值捕获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涵着某种意义^[19]。作为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集大成者,列斐伏尔从空间的意义维度,考察空间蕴含的社会意义及其与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关系。空间既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也是建构社会生活的一种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是“社会的产品”,是“现实化、客观化了,因而也是功能性的”^[1]。而空间的意义及其对现实的建构与维系,是在由“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

^① (YAQ, 20170517)为本文的访谈资料标注格式,其中“YAQ”表示受访者的姓名首字母,“20170517”表示访谈时间,下同。

一表征的空间”构成的三元组合中生成和实现的。“尽管空间已经受到历史和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塑造,但这样的影响和塑造一直是一种政治的过程。”因此,空间并不是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性之外的一个科学实体,而是始终具有政治性和战略性^[20]。推而言之,空间的生产自然也是充满政治性的过程。

1. 空间生产的三元组合

空间生产的三元组合中,空间实践是空间性生产以及每个社会构成特征的具体地点和空间集^[19],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空间,具有过程和结果双重属性。作为一类行动过程,空间实践是“社会空间性的物质形态的制造过程”^[21],这一过程是行动者实施行为并作用于空间的物质性实践活动。经由行动者物质性改造后的空间,成为承接和展示行动者行为经验的中介,这便是空间实践的结果维度。结果意义上的空间实践,是后续空间实践的始点。简言之,空间实践担负着社会构成物生产和再生产职能,以及包含着作为任何社会构成物之特征的特定地点和空间位置^[22],贯穿这一环节始终的是物质性实践。

空间的表征,指涉借用符号、话语和概念等知识对空间意义进行概念化抽象的过程,因此其又被称为构想的空间。这一过程是人们对既有的可感知的空间(实践)的符号化把握,从而理性地改造空间的活动^[23],是科学家、规划者、城市学家、分门别类的政要以及技术专家的空间^[19],因此也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空间。这一过程往往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诸多知识和意识形态等相联系,是在知识与权力的共谋中发生的。而这样的共谋发生,恰恰是人类行动的起点和限制条件,是“控制/借用—改变—控制/借用”的持续过程^[24]。因此,空间的表征体现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策略性借用符号和话语等具有“真理性”特征的知识,是对空间进行控制的过程。不过,空间的表征并不意味着只是空间的概念化抽象,而是通过实在的实践影响后呈现的明显客观性^[19]。

与空间的表征不同,表征的空间是人们居住和使用的、包含了复杂符号体系的空间,即日常生活的空间。由于符号具有鲜明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性,因此这一空间既是想象试图改变和占有的空间,也是体现统治、服从和反抗关系等“被统治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空间的使用者并非在资源的占有维度上占据优势地位,也不全被经由实践所传达的权力格局接受。相反,使用者往往是选取对自己有利的空间表征展开行动,因此常常以灵活的、个体差异的多元符号对抗“构想的空间”主导下的知识和秩序等一元符号^[25]。由此,空间生产的三维构件分别表征自然性、精神性和社会性三类属性。

三维构件之间并非完全相互独立,也不是否定之否定的阶段递进,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前后序列关系,而是彼此间存在着较强逻辑关联,即空间实践受制于空间的表征,而表征的空间的实现则依赖于空间的实践(图1)。

2. 空间的政治性及权力的空间隐喻

本体论层面,“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社会空间),也不是一个终点(一种社会的产品),而是一个具有手段或者工具意义的中介,……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1]。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具有鲜明的意图性和目的性,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26]。相较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空间的政治性宰制,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是挪用,即空间不再是用于交换的对象,而是被使用的工具^[2]。由于权力只有在空间中才能够生产知识并通过知识发挥效能^[22],因此政治维度上的被使用更多的是权力的施展工具。

空间的权力媒介特质和权力的空间运作机理表明,是否符合政治意图和具备权力工具属性,成为空间生产、演变、维系甚至衰亡的关键要因。在分工日益细密、体系比较庞大的现代社会,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如何作用于空间从而将其打造为可使用工具?实际上,政治权力的运作主要借由国家实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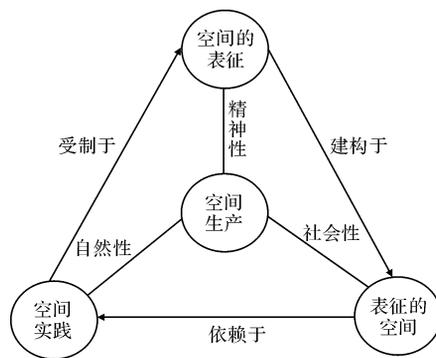


图1 空间生产的三元组合

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尽管两大国家机器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但在现代国家成长的不同阶段以及面对治理过程中的不同民众与事物,两者的作用发挥可能不完全相同。相较于实体暴力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殊性在于,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27],常常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表明阶级统治的正当性,进而获得社会的承认。与暴力迫使民众屈从相比,这样的潜移默化往往以符号的形式存在,更加深入且细致地将支配秩序铭刻进被统治者的身体与神经之中^[28]。治理过程中,国家往往依靠警察等国家机器打击威胁政权稳定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分子与事物;而对于领土内的绝大多数成员,则通过教育、文化、传媒等符号进行持久性的行为规训。

作为权力的媒介和方式,空间既体现为公共权力配置结构及其功能形态的展现场所^[29],也是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认同生成的重要场域。空间的政治性及其表现出的权力媒介特质意味着,公共空间的演变和维系深受现代政治话语的影响。权力运作相对于短期运动式摧毁,对空间的占有和使用更具持久性。乡村治理事务的多样性需要能够承担多重功能的空间支撑,其既需要提供隐喻权力的办公场所,也需要建造能够回应农村居民诸如文化活动等多种需求的服务场所,同时意识形态的宣传也离不开具体场所。而作为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农村公共空间的活动生活性和受众广泛性使其可以成为表现国家权力的重要媒介。事实上,在广大农村地区,除去村委会办公楼等表征公共权力的建筑,文化广场、文化礼堂等都是具有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治认同生成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公共空间成为隐喻政治权力的场所,规训和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①。一言以蔽之,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权力)和农村空间三者之间从来就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 祠堂的传统功能与存续价值捕获

据受访者介绍,朱氏族人逝世后,其牌位按辈份顺序供奉在宗祠内,逢年过节享受祭祀。青年族人结婚时,要在宗祠内举行祭祖仪式。每年的清明节,族长大开祠堂门三天,在宗祠内大摆宴席,作筵祭祖、招待族人。当族人违反家规家训和人伦道德以及叛逆不道时,族长会在宗祠内对其进行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朱氏祠堂并非仅仅发挥传统社会功能,20世纪40年代也承担着诸如政府临时办公和小学教育场所等功能,这些功能远远超出了祭祀这一传统功能。如1940年,民国安吉县政府为避战乱,从青松乡(现三官)迁到戴村驻扎,国民党县党部、民国县政府驻戴村朱氏宗祠,时间达两年之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氏后代朱月林曾利用宗祠创办初级小学等。可见,旨在维护宗族秩序的祠堂,一定程度上也间接维护着传统时期的国家统治。

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宗族制度被认为是封建宗法组织的基础,而祠堂这个主要承担传统社会功能的公共空间,也被认为是凝结封建宗法思想的物化载体,成为现代国家革命和政治建设必须摧毁的对象,尤其在祠堂被认为是“四旧”内容的时期。可以说,任何试图重构权力关系的斗争,都是一种重新组织他们的空间基础的斗争^[30]。因此,这个时期相当数量的祠堂被以政治支持的“暴力”手段损毁。同样,S村朱氏祠堂中的祖先牌位、堂匾被烧,同时雕刻被凿。如何将凝结数代人心理认同的祠堂获得政治认可并顺利保存下来,成为摆在S村朱氏家族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于具有浓厚传统社会意义的公共空间,有效匹配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推动其适应现代社会和政治需求成为其存续正当性的现实需要。依循空间生产逻辑,实现传统公共空间存续,关键是要编织出传统公共空间的存续正当性价值,即将传统公共空间打造为能够服务现代政治生活需要的功能载体。

^① 田野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2016年6-8月,笔者在鄂西北M乡蹲点调研时发现,该乡90%左右的村庄在市政府以奖代补政策支持下,将祠堂修缮或重建后打造为村级文化礼堂。改造后的祠堂,室内集政策宣讲、主题教育、科学普及、技能培训、传播现代文明于一身,正门墙壁悬挂村“两委”成员照片、联系方式和岗位承诺等。作为文化礼堂的祠堂,突出强调村民文化娱乐、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等载体价值,而非单纯的祭祀和信仰功能。

二、行动者的空间实践与存续意义编织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是政治权力借助符号机制,将主流的政治话语内化于民众的身体从而规训其日常实践的过程。由于空间是集物理、功能和社会性于一体的多重意义空间,运用表征政治权力的政治符号包装传统公共空间,发挥其政治意义上的教育和规训作用,成为传统公共空间可能发挥的政治价值。这样的功能价值,既可以打造为服务村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各类事务的空间场所,也可以装扮为宣传主流政治话语的功能空间。朱氏祠堂在近7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功能变迁?其依托的政治话语是什么?

1950年6月28日,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律第21条明确规定,“祠堂……均不得破坏……不合农民使用者……充作公用”。^①此时,朱氏祠堂取消了族人祭祖活动。考虑到祠堂的宗族集体所有,S村并未让农户居住而是充作公用。1951年初,邓小平提出“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31]。所谓政治工厂,就是要建立政治运动或者集会的大礼堂。土地改革完成后的集体化时代,礼堂成为村庄集体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象征,主要发挥演戏和跳舞等群众文化娱乐功能。1954年,S村响应农村建礼堂的政治话语要求,在朱氏宗祠前厅建立起50平方米左右的固定戏(舞)台。同时,逐步添置舞台幕布、布景、凳子、乐器、演出服饰、道具、箱笼和灯光等配套设施。直到1983年建成农民文化宫,该舞台一直作为S村村民文化活动的场所。

在由集体处置和充作公用的几年间,朱氏后代将祠堂打造成村委会和村办小学。1954年前,祠堂主要用作戴村小学的办学场所。1955年,S村成立村党支部,朱氏祠堂成为村党支部和农会办公地。“它是作为我们村的大队部。就是我们大队部在那里,那个三间一直就是我们大队部的,楼上是招待所,楼下是办公场所”(LWM,20180627)。1958年,在全国进入“大跃进”时,为保证全村妇女安心投入农业生产,S村在朱氏祠堂开办托儿所,并安排有管理经验的妇女当保育员,聘请外籍幼儿教师3人,共收有婴幼儿和8岁以下儿童160多人。直到1961年,因师资力量缺乏祠堂停办托儿所。

进入20世纪60年代,“祠堂”被认为是“四旧”的主要内容。除“文靖传第”牌匾被李村进士李志鲁后人藏匿后保留下来,祠堂中各种牌匾被焚烧。特殊时期话语因素的影响,使得朱氏祠堂的存续价值再次受到重创。然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S村就大力科学发展毛竹产业,其发展经验被全国广泛学习。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农林科学院亚林所毛竹科研队到S村蹲点,与S大队干部和群众一道进行毛竹丰产的各项试验和探索。为避免朱氏祠堂再度遭受冲击,S村将祠堂改造成研究毛竹产业的办公基地。这个阶段,朱氏祠堂还作为S大队大会堂使用过一段时间。70年代末,在全国开展第二次扫盲工作时,朱氏祠堂二楼与李村自然村LZX家和山场LAG家,一同成为S村的扫盲场地,重点组织全村未脱盲人员进行学习。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朱氏祠堂,除发挥少许传统社会功能外,基本处于废弃状态。

2002年,年久失修的朱氏祠堂几近倒塌。考虑到祠堂的历史价值,S村投资25万元,对朱氏宗祠进行了修缮。受访的村干部说到,“当时我们认为这么好的老房子没有了可惜,就各方争取20多万,请中心村的老百姓帮我们修护”(LWM,20180627)。同时,考虑到村庄老年人比较多,S村于2003年将其打造成老年活动中心,并按照功能类型将其划分为棋牌室、读书室和运动区。其中,在运动区配置老年健身器材。同年秋季,开设占地面积约为80平方米的图书报刊阅览室,该阅览室藏书1300余册、报刊5份。受访对象表示,“对外是朱氏宗祠,对内是我们村老年活动社。外面的地方就是打乒乓球,旁边就是老年人的健身地方,里面是老年活动社的棋牌室和读书室”(LWM,20180627)。朱氏祠堂发挥老年活动中心的功能持续十余年。2013年,S村在中心村主干道建成十三间综合楼,同年该村老年活动中心正式设在该综合楼上。

2008年,安吉县率先在全国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两个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10/content_4246.htm。

阶段后,S村集体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村庄环境改善等取得巨大进展。2013年,安吉县启动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工作,考核指标之一即为突出村庄内涵。创建过程中,S村着力突出村庄历史文化内涵,对村庄古建筑进行修复。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该村投入100余万元对朱氏祠堂进行全面修复和文化布展。修复后的朱氏宗祠基本恢复了建筑原貌,并作为景点对外开放。

2013年,为推动全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提档升级,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要求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作为省政府十件民生实事工程来抓,争取五年内全省行政村建成一批集学教型、礼仪型、娱乐型于一体的文化礼堂。作为一项夯实农村文化建设基础的社会工程,文化礼堂建设以进一步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和打造农村居民精神家园为目的,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首位,既注重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又强调实现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形成特色、形成品牌,做到“一村一色”“一堂一品”。“要统筹使用建设场所设施,按照为民、便民、利民的要求,选择群众便于聚集、环境相对优美的村居……也可利用现有设施进行改建扩建……努力把文化礼堂打造成为一个以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于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综合体。在这个空间中,既要合理设置展示展览,也要组织文化礼仪活动”^①。

2014年,S村将朱氏宗祠改建为文化礼堂,用35块展板布展了“千年双一”“红旗双一”和“美丽双一”三个专题。三个专题比较详细地回顾了S村的历史沿革、美好家园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时对村内崇德尚贤、“最美人物”、道德模范、优秀学子和成功人士以及其他重大事件进行集中展示。改建为文化礼堂的朱氏祠堂,成为村民传承历史文化的教育基地。文化礼堂正堂供奉朱氏祖先朱熹画像和龙灯,外墙醒目位置粉刷着《朱氏家规家训》。这一年清明节,在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持下,朱氏后代在朱氏宗祠内,重新恢复集体摆清明酒这一传统风俗,并举行公祭活动、重温朱氏家训家规,缅怀列祖列宗。与过去族长主持同族清明祭祖活动不同,现今的祭祖活动由村委会主持且不再区分自然村中的宗族姓氏。“他们祭祖就祭朱熹,但是姓方的(村里另一个姓氏)也来了,一个是方便,不用自己家里烧饭了……反正就是敞开的,你来就是50块钱一个人,80岁以上免费在这里吃”(HMX, 20190328)。允许非本族村民在朱氏祠堂祭祀自己的祖先,大大拓展了祠堂的公共性范围和内涵。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S村充分挖掘朱氏家规家训内容以及在当今家风传承中的积极作用。自2014年清明酒这一传统风俗恢复以来,该村每年都在清明祭祖活动中,由村党总支书记致辞,并由长者带领少先队员等若干人宣读家规家训。

安吉县是习近平同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为深入贯彻落实村民自治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2017年中央电视台联合浙江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在S村拍摄电视剧《青恋》相关片段。其中,作为云舍村村委会办公场地的朱氏祠堂,再次重现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场景。在朱氏祠堂内部,悬挂着“为人民服务”的鎏金大字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宣传标语,保留着“搞好民主选举 推动村民自治”等对联。电视剧的拍摄,使得朱氏祠堂逐渐成为外地单位、游客来村参观和游览的主要景点。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进一步加强改进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行政村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要“盘活资源,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建好用好农村文化活动广场……”,要“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和持续深入移风易俗”^②。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③。S村将村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在朱氏祠堂。2019年清明节,S村团委、工会、妇联、计生委、老年协会等组织,联合在朱氏祠堂举办“S村

① 参见《浙江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浙委办发〔2013〕37号)。

②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厅字〔2018〕78号)。

③ 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19/content_5366917.htm。

新时代文明实践‘清明传家风’活动”。此项活动由村委会主任 LWM 主持,街道党委委员 ZD、村党总支书记 ZXX 分别致辞,街道党委副书记 MAH 宣布活动开始。这一天,10 位小辈代表向长辈代表敬茶,以示对长辈的尊敬、爱戴,长辈向小辈传送新家规家训,希望下一代传承好朱氏宗族优良的家风家规并发扬光大。活动中,长辈 ZYM 给小辈讲述 S 村“敬老爱幼”的故事,ZYC 代表小辈作表态发言。

表 1 S 村朱氏祠堂近 70 年存续意义编织

时间(段)	主要政治话语(空间的表征)	主要功能	功能空间(表征的空间)
1954 年前	村村办小学	教育	小学校舍
1954—1983 年	政治工厂/农村礼堂	文化	戏台/舞台
1955 年	土地制度改革	办公	村党支部/农会办公场地
1958—1961 年	农业赶超	教育	托儿所
20 世纪 60—70 年代	宣传/研究 S 村毛竹经验	办公	毛竹科研队办公场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第二次扫盲运动	教育	脱盲运动学习场地
2003—2013 年	老年健康	健身	老年活动中心
2013 年至今	农村居民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	文化	文化礼堂
2014 年至今	弘扬优良家风	宣传	清明祭祖家规家训学习场地
2017 年至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传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梳理朱氏祠堂近 70 年的功能变迁发现,其是在集体处置和充作公用的总体性政治话语下展开的,而非传统时期完全由朱氏后代占有、使用和改造。由于不同阶段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点任务不同,主导朱氏祠堂的政治话语也不相同(表 1),进而承载的主要功能也不完全相同。整体来看,朱氏祠堂承担过文化、教育、办公、健身和宣传等相互交错的功能,服务的领域从最初的血缘性传统事务向治理性公共事务转变,公共性范围不断扩大,政治宣传成为其近年来主要功能。

无论祠堂功能如何变迁,其都是在主导性政治话语影响下展开的。也就是说,贯穿祠堂功能变迁始终的,是占据支配地位的权力主体的意识形态。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强关联性,使得空间具有较强的为政治服务的潜在功能。在公共空间的传统社会功能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可能障碍时,其存续势必受到现代政治话语的强势主导和支配。然而,村庄社会中的生活主体,并非现代政治话语的被动受体,而是极力寻求传统公共空间的存续价值。借用政治话语对传统公共空间进行策略装饰,使这一公共空间迎合现代政治的空间媒介需要,从而获得存续正当性,成为村庄行动者的主要策略。在这个意义上,近 70 年朱氏祠堂存续意义的编织,也是村庄主体持续适应政治话语要求主动实践的结果。这样的主动实践具体表现为,善于因时采纳并巧妙借用政治话语策略性装饰传统公共空间,在意义编织中持续重构空间的存续正当性。

三、传统公共空间合法性生产逻辑及其符号化

传统公共空间的存续意义是如何编织出来的?这样的意义编织产生了何种结果?在空间构成权力运作媒介的整体背景下,空间的生产势必受到权力的形塑。祠堂这一公共空间的传统社会功能,使得其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和政治话语的冲击对象。这样的冲击,既是短时间内政治权力维护的现实要求,也是维持其政治功能长期发挥的持续建构。因此,对既有的空间实践即传统公共空间进行概念化抽象,推动其发挥政治功能则成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这便是传统公共空间合法性生产的前置条件,也就是将其抽象化为政治意义上的“空间的表征”。

从“空间的表征”到“表征的空间”,是行动主体对空间进行装扮的过程。为迎合政治权力主体的行动需要,原本主要享用传统公共空间社会功能的生活主体,展开了政治维度的价值意义编织。这样的意义编织,是在借用政治话语策略装扮的行动下展开的。具体而言,生活主体或迎合政治话语,将传统公共空间打造为文化、教育和办公等公共空间,或通过政治符号填充等方式,融意识形态宣传于传统公共空间功能之中。于是,经由行动主体策略装扮的传统空间,成为“表征的空间”。这一表征的空间既保留了传统价值,也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成为同时具备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公共空间。与过去相比,经由政治符号填充和功能改造后的传统公共空间的政治性更加突出,同时传统

社会功能也发生了结构性改造,例如祛除了具有浓厚封建落后色彩的功能内容,更多的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朱氏祠堂功能的转变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而突出意识形态宣传和传承先辈优良家风家教功能,使得祠堂的受众范围也超脱于单一的族群观念。

上述由“空间的表征”到“表征的空间”的行动过程,实则是传统公共空间存续合法性^①生产的基本逻辑(图2)。在政治权力支配空间的整体语境下,生活主体在观念层面上对具有较强社会意义的传统公共空间进行政治价值捕获,即对其进行概念化抽象。而后,适应并巧妙借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话语,对传统公共空间进行符号化装饰,从而使传统公共空间具备特定阶段的政治功能需求,即经符号化填充后打造为表征的空间。这样的政治功能发挥的意义捕捉和空间实践,恰恰是持续重构空间存续正当性的过程。而这样的正当性生产结束后,原本具有较强社会属性的传统公共空间转变为兼具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且政治性超越了社会性的现代公共空间。

经由合法性生产的传统公共空间的结果如何?这可以从空间存续和权力生产两个角度展开。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而且更是其本体论基础或前提^[21]。对于空间本身而言,融入政治符号的空间实践强化了传统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工具价值,原本主要发挥较强社会聚合功能的公共空间融入了表意政治的功能,成为表意政治和聚合认同的统合性承载场。传统公共空间获得了政治权力主体的认可,亦即获得了存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经由政治符号装扮后的空间,逐渐显现出政治符号化迹象。突出地表现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具有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势必要求其显示出符号化的价值。作为先行试点的现实场所,本身具有的示范引领价值也将更加凸显其政治符号化迹象。而空间的政治符号化,也进一步再生产了空间的存续合法性。

抽象的空间是一个权力工具。统治阶级使用抽象空间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取得对不断地扩大的空间的控制权^[21]。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公共空间政治化改造的价值恰恰在于,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持续荡涤着人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和理解,空间成为权力合法性再生产的媒介机制。实际上,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在;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他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21]。由此来看,经有政治符号填充的传统公共空间,实现了政治权力和空间本身合法性的双重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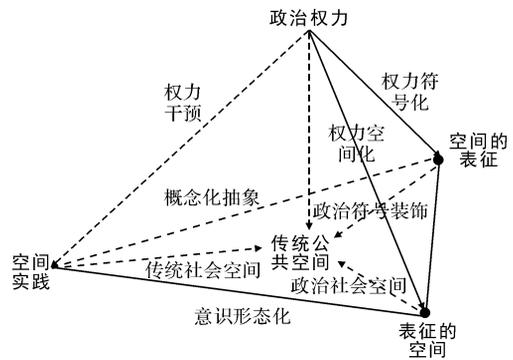


图2 传统公共空间存续合法性生产的基本逻辑

四、结论与讨论

空间的意义之维表明,同一空间隐含着多重内涵和意义。作为完全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32],空间会被不同的意义反复浇筑^[26]。祠堂是“特定人群”的公共空间,主要发挥着颂扬祖先、凝聚同族、维护秩序和精神寄托等传统社会功能。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个案中的朱氏宗祠服务的主要对象为本宗族这一“特定人群”,承担着家族祭祀、族内重大事务议决、族规制定和执行以及宗族“生聚教训”等功能。可以说,祠堂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传统性、血缘性和宗族性特征。

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和条件。事实上,权力和空间从来就不是分离的,而是无时不刻的勾连着。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使得空间的生成、存续和变迁无时不刻受到权力的影响甚至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宗祠较强的传统社会功能很难适应现代政治发展需要,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政治革命改造的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空间形式和功能会在历史界定的社会中表达和维护国家的

^① 此处所讲的合法性,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法律是否允许或禁止的行为,而是指事物存在被广泛接受的程度,即传统公共空间改造后功能发挥被现代政治接受的程度。

权力关系^[33],但这样的历史界定并不排斥政治性。相反,同一空间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存在政治性,只不过不同时期空间服务的权力主体不同,其政治性在内涵界定和利益指涉上不全相同。同样,祠堂的传统性并不排斥政治性,因为“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祠堂的上述功能也间接地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的政治性始终是一个永恒范畴,这种政治性不仅在现代社会存在,也存在于传统社会中。

尽管空间生产是一个受政治话语和权力结构影响的过程,但作为生活主体维系情感和凝结力量的重要物质载体,祠堂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符号,并长期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也因此,融入政治符号后的传统公共空间实现了结构改造和功能调适,但这样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完全清除其传统属性,相反其传统社会功能得以适当保留,并在现阶段的乡风文明实践中发挥着持久性作用。由此来看,传统与现代之间相互共存,并具有明显的交融性。

个案中祠堂经由符号化填充后,功能大致经历了文化、教育、办公和宣传等多重变迁,这些功能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而将祠堂打造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始终是贯穿空间存续行动的主旋律,这便是存续意义编织的政治逻辑。这样的行动者的空间实践,是权力主体主动占领甚至支配空间的过程。不过,权力主体并非空间实践的真正主体,而是对空间进行概念化构想。相反,祠堂功能的变迁则是村庄生活主体的主动适应性改造。这样的适应性改造,具体表现为生活主体主动适应和灵活采纳政治话语的权宜性行动,既是存续价值捕获和空间改造的理性化过程,也是从空间的表征向表征的空间迈进的结果。从这个维度上讲,权力(意识形态)、行动(日常生活)与空间生产(存续合法性生产)构成理解传统公共空间的三大关键要素。从结果来看,经由政治符号填充后的传统公共空间,融合了传统社会功能和现代政治功能,成为承载两大功能的统合性空间。这样的统合性空间,在强化传统公共空间意识形态属性显性功能的同时,也持续地再生产着具有隐性内涵的权力主体存在合法性。

资本主义社会快速上升时期,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剧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问题等^[2]构成空间生产理论生成的社会背景。其核心要点是强调空间是资本运作的客观前提,权力与资本构成空间生产的基本动力。作为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空间的概念化建构由科学家和规划师等主体主导。资本主义社会中,经由上述主体概念化建构后的空间生产,是一种同质化、分离化和等级化等空间策略同步进行的矛盾过程^[34],服务于资本原始积累和生产关系再生产是空间生产的目的所在。而朱氏祠堂功能变迁表明,空间的生产实则是权力主体和生活主体行为互动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权力主体主导的空间的表征经过实践活动干预空间实践进而形成表征的空间,而贯穿空间表征的是权力主体及其意识形态。可见,传统公共空间的概念化建构以权力主体建构合法性为主要目的,生活主体的策略行动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资本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的影响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不同情境中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和实践图景不尽然相同,民众及其行动应该成为探讨空间生产的重要维度。

回到空间生产的三元组合理论中,无论是列斐伏尔还是后续研究都将其置于过程性和分裂式的语境中展开分析。尽管表征的空间是三维构件的含义叠加,但在研究过程中,既有研究更多地是将其置于过程性和序列式的视域中使用,即将空间实践视为空间生产的下游段,认为是空间概念化抽象和经由符号化填充的实体空间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载体。而作为中间环节的概念化抽象,具有衔接性功能,是行动主体对空间进行意义性构想和赋予空间存续价值的过程,构想和价值的空间展现则是其最终目的。然而,本文的朱氏祠堂本身就具有物理性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事实上,无论是意识形态建构之需还是生活主体权宜行动,都不同程度地改造着祠堂的物理结构,突出表现在从过去的前进四厢一门楼改造为三进四厢一门楼。只不过是相较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建构,物理形态的改变程度相对较小。反思空间政治和空间批判理论,发现空间生产的三维构件并非完全割裂而是有机嵌合,空间的物理形态和价值意义都被改造着,只不过后者远远超过前者。

现今的朱氏祠堂正堂仍然供奉着朱氏祖先朱熹画像和龙灯,也摆放着朱氏先人的牌位,在每年的清明节仍然进行着诸如祭祖等传统活动。不过这样的祭祖活动,更多地是弘扬朱子文化、宣传村规村

训和传承家教家风。活动的参与主体不仅仅是朱氏后代,而是扩大到政府、村级组织和全体村民。在持续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今天,政治符号填充等现代化改造后的朱氏祠堂更多地承担着宣传先进政治思想的主要功能。这表明,现代政治生活中传统公共空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政治符号与传统社会符号能够相安共生且良性互动于同一空间,应赋予其现代意义而非全然抛弃。而如何赋予其现代意义进而彰显其时代价值则是需要深刻思考的。

参 考 文 献

- [1]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2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 亨利·列斐伏尔.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3] 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51-57.
- [4] 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6):61-73.
- [5] 何兰萍.公共空间与文化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6] 王玲.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以公共空间为视角[J].理论与改革,2010(5):29-32.
- [7]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8] 陈壁生.礼在古今之间——“城市祠堂”祭祀的复兴[J].开放时代,2014(6):99-110.
- [9] 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0] 朱华友,陈宁宁.村落祠堂的功能演变及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基于温州市莘塍镇50个祠堂的整体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9(2):86-94.
- [11] 方利山.徽州宗族祠堂调查与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
- [12] 武志伟,马广海.仪式重构与村落整合——以烟台市北头村祠堂修缮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17(3):69-75.
- [13] 吴祖鲲,王慧妹.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7):155-162.
- [14] 徐俊六.族群记忆、社会变迁与家国同构:宗祠、族谱与祖塋的人类学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18(2):208-216.
- [15] 焦长权,周飞舟,王绍琛,等.祠堂与祖厝:“晋江精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J].东南学术,2015(2):21-27.
- [16] 靳浩辉.农村社会治理视阈下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与重构——以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为例[J].理论月刊,2018(7):161-167.
- [17] 袁振杰,高权,黄文炜.城镇化背景下村落神圣空间政治性的建构——以广州A村宗祠为例[J].人文地理,2016(5):71-79.
- [18] 林聚任.论空间的社会性——一个理论议题的探讨[J].开放时代,2015(6):135-144.
- [19]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 [20]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M]. London:Allison & Busby,1978.
- [21]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22] 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167-191.
- [23] 冯雷.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 [24] 陈薇.城市社区权力秩序: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25] 徐小霞.理论、空间与符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中的符号学维度[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9-100.
- [26]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27]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28] 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29] 吴新叶.农村基层非政府公共组织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0] HARVEY,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M].Oxford:Wiley-Blackwell,1989.
- [31] 丁贤勇.祠堂·学堂·礼堂:20世纪中国乡土社会公共空间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 [32] 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J]. Antipode,1976,8(2):30-37.
- [33] CASTELLS M. Crisis, planning,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managing the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ace and societ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1983(1):3-21.
- [34] 林密.意识形态、日常生活与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金会平)